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重译考辨

On Retranslation

刘桂兰/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重译考辨

On Retranslation

刘桂兰/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译考辨/刘桂兰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5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0575 - 9

I. 重… II. 刘…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2400 号

重译考辨

作 者: 刘桂兰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苗 于湛瑶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 于 志 杨长妹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1(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h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 × 975 毫米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12 - 0575 - 9

定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当今世界各国语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事业不断繁荣，重译问题再次凸显。所谓重译，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称之为复译，并明确肯定其必要性。后来虽有些争论，但大多数人认为，至少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所以重译、多译现象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很有好处。赞成和研究重译的不少，但以此专著形式，作“重译考辨”，既对重译现象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描写分析，又基于相关研究建构重译理论，实属国内译界首创。

全书的基本框架是：重译现象的历时综述——成因学理的共时分析——策略技巧的方法论探寻——总结重译的本质属性。明确按照从实践到理论而又返回实践的思路，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国内外重译的出现和发展，通过对重译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的分析，探寻当今大量重译的理论基础、实践特征和可为度，从而确立重译的学理地位和发展空间。这样的研究无疑可以丰富译学的理论建设，对指导翻译实践也大有启迪。

书中首先对“重译”等用语作出了明确合理的界定。进而依据国内外大量的重译文本及文献资料，通过甄别、统计、归类，以较为丰富的语料说明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重译现象：以翻译文本为参照系的重译，如不同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的重译和非文学类的重译；以翻译主体（原文本和目标文本创作者）为参照系的重译；以翻译语言为参照系的重译，即译出语和译入语方向不同的重译，包括间接译自第三种语言的翻译。此外，还就不同的历史时代分别列举了一些经典作品的重译。这是重译现象的显象外观，因此也就还有对重译现象的隐象内察：走入时代的重译，即为了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重译；走近读者的重译，即为了适应不同读者不同需要的重译，以及走向完善的重译，即纯粹是为了对原有译本作出重大改进的重译。这样的内察探究，其实无疑是提出了一般重译的三个原因和原则：为了新时代的需要，为了不同读者的需要，或为了改进原译的需要。



本书主要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两个层面对重译现象进行考辨。在文学艺术层面,作者借助文艺学、接受美学、哲学诠释学和解构主义等学说,较为深入地阐明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文本意义的生成性和多元丰富性、文本生命的无限延续等尖端论题,并将其运用于解释翻译和重译的实际理据,从而使重译的历史文化、语言现实和个体(原作者、译者主体和读者)异同的事实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哲学学理的提升。在科学技术层面,作者抓住了互文性和重译度两大关键,具体分析了同一原著的各译本间重复、参考、借用的程度,探讨了原文本与译文本、前译本与复译本以及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多重互文关系。特别对于重译的语言演变,书中以丰富的实例说明了语言的承继性与差异性,以及语言处理策略和技巧的异同。这既是基于丰富语料的归纳性研究,也是在互文性理论基础上对重译的可行性的证明,及对合理重译的策略与技巧的探求。

作者最后选择比较诗学、比较美学、翻译科学和翻译生态发展观四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重译的创造性、对重译的鉴别和评判,以及重译的技法要点。这既是糅合了重译的艺术论与科学论,指明了一种统一和谐发展的重译研究观,又深入地阐发了重译时必须注意的方方面面。由此而凸显了本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借此机会,本人还想特别指出,本书作者刘桂兰副教授是位年轻的大学英语教师,平日教学等工作之繁忙是众所周知的,但她能锲而不舍、厚积薄发,推出这样一部专著,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正因为她的具体条件,加上这课题的鲜见,书中的某些不足也就不难谅解了。雏鹰出谷初亮翅,鲲鹏凌霄终有时。

是为序。

黄振定

于岳麓山下

2009年12月28日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1

1.1 题义 / 1

1.2 概述 / 1

第二章 “重译”及其研究 / 5

2.1 “重译”定义 / 6

2.2 重译历史回顾 / 10

2.3 重译研究综述 / 17

2.3.1 重译版本研究 / 17

2.3.2 重译类型研究 / 19

2.3.3 重译价值研究 / 20

2.3.4 重译本关系研究 / 21

2.3.5 重译理论研究 / 23

2.3.6 重译的实证性研究 / 29

第三章 重译现象概观 / 33

3.1 重译显象外观 / 33

3.1.1 以翻译文本为参照的重译 / 33

3.1.2 以翻译主体为参照的重译 / 37

3.1.3 以翻译语言为参照的重译 / 43



- 3.2 重译隐因内察 / 44
 - 3.2.1 走入时代的重译 / 44
 - 3.2.2 走近读者的重译 / 47
 - 3.2.3 走向完善的重译 / 49

第四章 重译的艺术论考辨 / 53

- 4.1 文艺理论及其翻译引借 / 53
 - 4.1.1 文论的发展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53
 - 4.1.2 翻译理论的发展及其向文论的引借 / 58
 - 4.1.3 现当代文论对重译的诠释 / 64
- 4.2 译事客体与重译 / 67
 - 4.2.1 文本的开放性与重译 / 67
 - 4.2.2 语言的多样性与重译 / 75
- 4.3 译事主体与重译 / 80
 - 4.3.1 译者的主体性与重译 / 81
 - 4.3.2 读者的期待视野与重译 / 87
 - 4.3.3 重译的主体性研究 / 92
- 4.4 翻译的艺术超越性与重译 / 100
 - 4.4.1 翻译的遗憾召唤重译 / 100
 - 4.4.2 翻译的发展催生重译 / 102

第五章 重译的科学论考辨 / 104

- 5.1 重译的互文性 / 105
 - 5.1.1 互文性理论 / 105



5.1.2	互文性与翻译	/ 108
5.1.3	互文性与重译	/ 121
5.2	互文性与重译限度	/ 123
5.2.1	互文性与“重译限度”	/ 123
5.2.2	重译限度的认定	/ 126
5.3	重译的策略与技巧	/ 130
5.3.1	重译策略的认定	/ 131
5.3.2	重译技巧的认定	/ 138
第六章	重译艺术论与科学论的和谐发展	/ 144
6.1	比较文学谈重译创造	/ 144
6.2	比较美学谈重译鉴别	/ 146
6.3	翻译科学立论谈重译技法	/ 148
6.4	翻译生态发展谈重译评判	/ 149
第七章	结语	/ 151
附录		/ 153
参考文献		/ 190
后记		/ 204



第一章

绪论

1.1 题义

“辨”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春秋诸子百家论战时就具雏形，根据《文章辨体序说》收录，“中间历叙古今治乱相寻之故”（吴纳：44），盖有针对名义不清混乱之局面予以澄清治理之作是也。

又有《文体明辨序说》载：

按字书云：“辨，判别也。”其字从言，或从刀，盖执其言行之是非真伪而以大义断之也。近世魏校为从刀，而古文不载，未敢从也。汉以前，初无作者，故文选莫载，而刘勰不著其说。至唐韩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实出于孟庄。盖非本乎至当不易之理，而以反复曲折之词发之，未有能工者也。故今取名家诸作，以式学者。（徐师曾：133）

今拟文以“辨”既“治义”又“判理”之用也，而且“辨”与“辩”非有异义之分，因为文体“世多通用”，故本书亦沿袭通用，此其一。

“重译考辨”既对重译之实践（现象）做描写性分析，又对重译理论的发展进行建构研究，还对重译研究的研究进行归纳统计，此其二。

今取名家诸作，一展译家名品，分类比录，对照文采，择善而学，与时俱进，丰富译学，此其三。

对重译现象作艺术与科学层面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对重译理论作语言学、文艺美学、文化学、认知心理学、现象生态学的诠释，此其四。故以“辨”名篇，着力在重译现象的梳理，指归于译学理性的提升。

1.2 概述

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语言不断交融的时代背景下，重译伴随着翻译事业的繁荣而成为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关于重译，很多学者



都有明确的观点和看法。鲁迅当年称之为复译，他的一些提法至今仍然是适用的。关于重译必要性的争论是在三十年代的穆木天与鲁迅之间发端。随后对于重译现象的争议和研究文章也越来越多。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 2003 年在翻译理论界提出了筛选积淀重译论。还有其他一些翻译界人士也就重译现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很多学者在重译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认为重译是有必要的，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重译、多译现象亦可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理论成果中得到全面的阐释。国外的重译研究也由来已久，从最开始的圣经译本到后现代的童话故事，源远流长。概观近年的重译现象有两种势态：一种是对已有译作的作品重译，一种是以以前未曾译介的作品现在同时出现了多种译本。目前国内外对于重译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对同一作品不同复译本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针对复译本与前译本作艺术审美层面的优劣高下比较，这一研究属于翻译实践层面的探讨。二是对随见的重译现象作译学上的阐释，有社会历史角度的文化学追踪和文学审美角度的探求，有解释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这些研究多为感性认识，粗泛讨论较多，理论建构尚需进一步求索。三是从现代及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寻找重译的理论依据，如解构主义接受理论可以对重译现象作出强有力的注解。这一研究有理论的探讨，但与实践的联系、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大显著。因此，本课题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重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辨别，通过古往今来的重译事实以及有关重译的论说吸纳合理的因子，并给予重译以应有的学理定位和译学正名。这一课题旨在通过对重译的考辨研究为翻译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自由的、开放的空间，通过繁富的重译现象解析翻译的本质、了解重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联，从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为用与学说建构。

本课题首先对重译概念作历史回顾和清理，并给予界定。通过例举不同类型的重译现象，从艺术审美、科学技巧、学理渊源三个方面进行重译考辨，即从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学语言风格等方面对重译现象进行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对其繁荣与争议进行文化反思。同时通过对重译文本作互文性考察和重译度的认定，从方法论上考辨重译，即探求重译的可行性和重译的策略与技巧，最后对重译学理探源溯流，试以此建构重译理论、规约重译实践。本课题拟作如下方面的具体讨论：

首先界定重译概念，列举重译现象。重译现象在翻译领域中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对于重译，却很少有人给出明确的定义。国内有许渊冲和袁筱一等教授的论述，但每个学者对于重译的理解不同，所使用的学术语言也不同，就重



译概念相类的有复译、再译等等，说法不一，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再认识。并且通过对相关的重译文本及文献资料的统计、甄别、归类、研究，分析说明不同类型的重译现象：以翻译客体为参照系的重译，如不同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的重译和非文学类的重译；以翻译主体即原文本作者和译文本作者为参照系的重译；还有与上述分类相互交叉重叠的中文文本翻译成多种外语的情况和外文著作翻译成不同中文文本形式的现象。

其次，对重译现象进行文学艺术层面的考辨。从时代背景与现实需求两方面作分析，通过现象与本质的争议探寻重译论理据。这一论题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对重译客体的研究辨识重译是历史的必然性发展。由于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化，原文本的思想内容也会得到不断发掘和丰富。翻译载体的语言形式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对同一部作品，不同时代必然会有不同的语言阐释。这种语言阐释的差异性不仅反映了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更反映时代的文化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对重译主体的研究辨识重译是现实的必要性旨归。不同的人对文学文本的艺术意境的理解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等的理解也有所差异。从译者方面来说，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总会根据自己的期待对文本加以选择，选择合乎其自身修养、心理、志趣的部分来解读翻译。时间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同一原著理解的无限性。而译文作者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从我所处的文化大背景来解读异国的语言文化、社会历史，这种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不同译作的产生。从接受者方面来说，译文读者千差万别，他们有着各自的期待视野与审美追求，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体验的加深及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因此，不断满足读者变化着的审美期待是译者的天职，重译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其三，对重译现象作科学技术层面的考辨。也就是进行重译的互文性考察和重译度的认定，探讨如下问题：同一原作的重译本有哪些？各译本之间有多大程度的重复或参考、借用、引用抑或继承？互文性与重译度是什么逻辑关系？相互关联度又是什么？由而进一步厘清三个概念：文本关联度、互文性（文本间性）、重译度（复现率），探讨原文本与译文本、前译本与复译本、作者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多重互文关系。这一议题在分析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推导和理论归纳。在互文性研究基础上再进行重译的可行性考辨和重译的策略与技巧的探求。翻译的互文研究为重译的可行性提供理论的支撑和实践的方



法，重译度的考察为寻求重译的制约因素、把握重译策略与技巧提供了科学合理的途径。

其四，对重译现象作翻译学的理论考辨。这一议题主要建立在前两章的讨论上，归纳已有的重译理论文献资料，透析文学界、翻译界对重译的倡导和论述，逐步构建重译理论。这里重译论的学理依据来源于对中西译论和中外译家、论家的不同观点与学理主张的观照。对重译的本质、目的、过程、接受与传播等作学理考辨，从重译关涉的内外层面寻找驱动重译、制约重译的因素。

总之，本案先按时代分别列举经典作品重译的现象、分析原因，再按实践到理论而又返回实践的过程描述重译的发展和形成；从对重译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进行的分析中探寻处于互文网络中的重译在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操作中的影响因子和可为度，从而确立重译的学理地位和发展空间，丰富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建构。即这一课题的基本思路为：重译现象的历时综述——成因学理的共时分析——策略技巧的方法论探寻——总结重译的本质属性。主要运用文献整理与调查统计、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进行归纳论证及演绎推理。总课题作纵向历时追索的理论探讨，重点部分作横向拓展分析和理据归结。通过对重译现象的定向透析，尤其是对重译的互文性质和前文本与重译本之间关联度的分析研究，揭示重译的学理本质和实践策略；通过理论研究和重译实践分析，逐步揭示译本之间的互文关联，进行重译度的认定，为重译复译提供合理可行的策略与参考。



第二章

“重译”及其研究

在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文本、历史读本姿态万千，各以不同的面目存现于世：有的是以不同的媒介载体如音像、影视代替文字形式，有的是同一种形式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呈现。典籍、经书、文学原著等随时代变更而不断翻新，于是有了名著重译、复译、再版、改编等纷繁复杂的样式。文学翻译实践不免醇驳互殊，瑕瑜共见，又不乏“更上层楼”的姿态和不断创新、不少超越的见识。重译在现代看似是泛陈可述的文化现象，却也是历久弥新、一代代人前“铺”后续的“行为”，也只能是从实践中归纳抽象才逐渐形成相关的翻译理论。因此，面对繁杂的重译现象和众说纷纭的认识，本章拟从重译概念、重译历史、重译研究的角度做一概略的梳理和辨识，以厘清“重译”实践与理论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态势。

我国的翻译历史经过了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至晚清的西学翻译、民国时期至新文学运动时期的翻译、1949 年建国以后的翻译这四次大规模的繁荣时期。从东汉后经六朝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第一次翻译高潮，当时的教义、经文首先是经梵文进入汉语，其华文阐释为佛教的引介发展提供了本源和根基。史上的对外交流一直不断，唐朝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到明末清初一度封闭的国门渐开，此后外来文化大量引入，大批外国文学、科技文本输入国内，形成有规模的输入型外汉翻译。其中又以晚清严复等人的科技翻译、林纾的文学翻译为翘首。这一时期的翻译以实务济世为目的，因而拿来主义的节译、选译及意译甚至编译成为主流，林纾翻译的百余种外国小说也多是经他人传述再记录改编而成。这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大批作家、译家、文学爱好者重新翻译文学名著创造了诸多完善甚而改革的重译机会。第三期的翻译繁荣一方面表现为译介更多的国外范本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表现为大量重译原有的文学著作或国人以前有所提及或已有介绍的作品，主要体现为鲁迅、周作人、梁实秋、胡适、林语堂、茅盾等一大批文人的合力贡献。五四运动前后



的文学界已经译介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读者已非常熟悉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拜伦、雨果、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雪莱、福楼拜、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萧伯纳以及前俄罗斯和原苏联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柯夫、勃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而且这些作品的中译本成了人们喜爱阅读的著作。与此同时，传译这些伟大作品的杰出译家，如郭沫若、傅雷、朱光潜、朱生豪、李健吾、叶君健、鲁迅、沈雁冰、巴金、郑振铎、耿济之、曹靖华等等，他们神妙的译笔也留在人们的心目中、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双向化发展，输出型的汉外翻译相继而来。中国文学经典、四书五经等典籍也翻译介绍到国外，有不同语言的译本面世。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的支持，翻译出现第四次高潮。读者不再满足于一家之言或单一的权威文本。翻译的市场化带来了五花八门的、品味不同的文本。“阳春白雪”的经典文学和学术名著、专业教科书，“下里巴人”般浅显易懂的通俗读物，一应俱全。于是，重译更加普遍、规模也更大，更具有组织性、官方性。显而易见，重译是文化发达时期特别是在翻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才出现的。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近百年的文学重译现象，特别是这中间的两次繁荣可以清楚地辨识重译发展的轨迹以及它与文艺自身发展之间的律动。

2.1 “重译”定义

翻译的历史既反映了经典名著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也勾画了重译的演进轨迹，其中近现代百年来的名家译家对重译相关概念的论述，包括重译、复译、转译的提法也是众说纷纭。

最早对于佛经翻译高潮时期出现的重译本，译经名家已提出翻译的不同概念和方法。据《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记载：

佛教史家把罗什（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叫做“古译”，把罗什及其后的译经叫做“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独让给玄奘。（陈福康，2000：29）

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不空（一说为义净）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罗什以前的支谦、道安主持的经译多为“译胡为汉”、“近于质直”，而罗什之后的译经，文饰大增，“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因“安（道安）惟不通梵文，故兢兢于失实，什（罗什）既华梵两晓，则游刃有余地



也。”（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转引自：陈福康，2000：17），而玄奘以前之译经，“都先按梵文逐字搬译，然后再按照汉语语法改写，最后由笔人润饰，其中或增或减，多失原意。”玄奘则不然，因为他精通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ibid）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而且罗什与玄奘分别成为佛经翻译的分水岭式人物。佛教经义正是在“古译”、“旧译”、“新译”的承继上传入中原，形成体系。其中许多关于经义的反复释解应该算是翻译史上的第一期繁荣出现的重译论述。

此外，北宋时期高僧赞宁主持编撰的《宋高僧传》中的《译经篇》把“重译直译”归为“立新意”的六例之一，他认为译经中的直接从印度传来为“直译”，经西域传来后从胡语翻译为“重译”（即今日的转译）。实际上，转译是重译的一种，是翻译的初始形式之一，在佛经翻译开始时就存在。

清末维新派首要人物梁启超在1897年《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第七章《论译书》中提到旧译不好，“当取原著重译”，而且还提到了如何避免对同一新书“彼此并译”的问题。这些是当时别人较少论述的（陈福康，2000：100），也是维新思想的领先作为，实为“救焚拯溺之用”（ibid：98）。

民国时期教育家蔡元培在1906年《国文学讲义》写的序言中论述了他对译学的见解，并提出了“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之说（ibid：139）。蔡氏称为中国特有的“再译”指的是古今语言不统一而至的翻译，这也就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根据，它隐示了文言文译作要适时而“再译”为白话文的必要。

与林纾同时代开始从事翻译活动的周桂笙（主译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及童话作品），在1907年《月月小说》第7期上坚决谴责了当时滥译、冒译以及剽窃之歪风，当然这当中的重译是不可少的。其时与周并称的徐念慈也在他的《余之小说观》中抨击不良译风、匡正译界弊端时指出：“今者竞尚译本，各不相伴，以致一册数译，彼此互见。”（ibid：162）这里一册数译就是重译，可见当时重译风气之盛。

鲁迅在1935年写的《非有复译不可》一文提出“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次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鲁迅先生所说的再来一次的复译就是重译。鲁迅对“复译”还有更深一层的论述：“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的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



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陈福康,2000:306)。许广平在《鲁迅与翻译》(罗新璋,1984:315)曾专门谈及“重译与复译问题”,其中“重译”其实指的是“转译”,而“复译”即指当今之通称“重译”,这些论述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当代译论家对“重译”的定义和论说也是层出不穷。

罗新璋认为,“复译”和“重译”概念不同,“已有译本之后,复出另译本,似宜称“复译本”(罗新璋,1995:29~31),但他也承认,“复译”时下常被称作“重译”。

许钧认为,“复译,也称重译,法语为 *retraduction*,含有重新翻译,再次翻译的意思”。“从时间角度看,这种文学作品复译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有译本的先后之分,即几个译本有时间上的差距,带有后人对前人工作的继承、发展或超越的性质;另一种则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出现两种或数种译本。”(许钧,1994)

许渊冲也认为,“重译有两个意思:一是自己译过的作品,重新再译一次;二是别人译过的作品,自己重复再译一遍。”许渊冲(1996:56~59)还从约定俗成的角度说明“重译”比“复译”更为人们接受。

辜正坤提出了“筛选积淀重译论”,指在合理利用一切已经产生的译本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并注入新的更好的表达法,最终合成翻译出最佳度近似于原作的译作。(辜正坤,2003)

王宏印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5:171~174)一书中把转译、重译、复译都归为翻译途径,认为重译与复译是区别于原译与初译之外的另一种翻译活动,而且是在原译和初译的基础上进行的,是非原创性翻译。他把重译界定为“与初译相对,指原译者在自己的初译出版或发表若干时间以后,由于不满足于初译的质量,谋求改进,或者觉得时过境迁,语言变异,有更更新的必要,或者出于翻译策略的考虑,对于初译进行大规模修订,将其中的大部分重新翻译,以上种种均被视为重译。或者干脆推倒重来,另起炉灶,那就更是重译无疑了。”复译是“与原译相对,指一部作品在有了原译(也就是初译)之后,又有了别的翻译活动和新的译本。这种有别于初译和原译的重复翻译,就是复译。它之所以不同于重译,在于翻译主体不是原译者或初译者,而是另



外一个人。”实际上，这种重译和复译都是本书所考察和概括的对象，是广义上的重译。

王向远认为首译和复译是两种译作类型，是依据同一语种的译文首次出现后重复出现而做出的划分。在翻译文学中，某种作品以某一语种的语言被首次译出，就叫首译或首译本。“首译”之后出现的译本，即重复翻译，就叫复译或复译本。有人也将“复译”叫做“重译”，但“重译”现多指同一个翻译家对已翻译过的作品的重新翻译，因此在概念上“复译”与“重译”应加以区分。（王向远，2007：173~174）

根据索引资料，许多翻译界人士也就重译现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谢天振、王力军、郭建中、刘晓丽、罗国林、郭宏安、秦文华等），译论家也多采用“重译”来表示“已有译本之后，复出另译本”。有人认为《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词典都只收录了“重译”的词条而没有“复译”的词条，“复译”似乎已给人以“旧词”的感觉，其涵盖义不如“重译”广，且上述几本辞书皆不列，而“重译”就是重新翻译，词义直截了当。（杨士焯，2004）

也有人指出复译在英语中称为 retranslation，可指回译（back translation）、重译（indirect translation）和复译本身（new translation 或 multiple translations）三种形式的翻译（李明：2006）。这种三分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重译、复译、再译涉及的范畴，而且区别开了回译、转译、重译。实际上其中的第二种形式是翻译学上定义的“转译”，即译文不是直接来自最初的原文，而是通过第三种语言的转译作品翻译而来，如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从波斯语翻译成英语后，我国诗人郭沫若、黄克孙又从英语的《鲁拜集》译成汉语的《鲁拜集》，即属转译。还有五四期间的文人从日语文学翻译的欧洲作品，也是转译。有人也称为“间接翻译”，指以非原语的译本为依据所做的翻译（陈言，2005）。本书针对的就是这里第三类所指的“new translation”和“multiple translations”（Almberg, 1995: 925）。这两种情形一种是译者对自己以往旧译的修正润色的重译（罗新璋，1991（4）），另一种是先前已有他人译本，但“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林煌天，1997：219），这样就有了多种译本的存在，因而也叫多重翻译（multiple translations）。还有人认为重译或称复译，法语为 retraduction，英语则是 retranslation，是指对原作的重新翻译、再次翻译（李新朝、张璘，2008b）。而且重译可以分共时重译（synchronic translation）和历时重译（dia-